



# 文以战的革命生涯

## ——从军、从教、做编辑、做统战

□ 王华兴

### 笃志从教 为国育才

1948年元月中旬,父母埋葬之事办妥,部队转移,去向不明。文以战不愿丢革命工作,日行百余里,到河北邢台北方大学,演奏了京剧曲牌“夜深沉”,被收到该校艺术系。8月份,该校与华北大学合并,他被分配到中教部直属,由延安“保小”等3个干部子弟小学合并的华北育才小学任教师。次年,随中央进京,校址设在先农坛,校名改为北京育才小学。

文以战分到育才小学不几天,北方局为他联系上了原独四旅的工作关系。部队的意见是“能归队最好,党籍、军龄均可接续,若愿意教学也可以,只是组织关系半年多了算自行脱离。”他再三考虑,党籍是自己的政治生命,固然重要,但新中国即将成立,需要人才去建设和治理。相比之下,孰重孰轻,昭然若揭。同时他还记着《礼记·学记》中的古训:“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宋·胡瑗《松滋县学记》)的道理。故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循循善诱,启智明理。

1951年末,他被借调教育部参加了起草《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回校后向校长提出要求,由教六年级语文改教从小学一年级识字开始,校长应允。在6年的教学时间里,他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从课本内容到学生学习接收的实际,以及教师在教学上的困惑,在反复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总结编写出了两篇讲稿范例,《〈老实话〉和思想教育》《我们班的卫生工作》,3篇有关课本改进的商酌问题,《当前长课文教学中的问题和改进意见》《中年级常识性课文教学的一些情况》《论小学语文改进问题》。这些文章在《育才校刊》和《北京教育》上发表后,在小学语文教学会议上做了介绍,

后又收编在教育部小学司《教学经验》一书里。为此,引起了不少学校老师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为建国初期的学校开辟了蹊径,拓宽了路子。为此,前来育才小学参观、学习和取经者,你来我往,川流不息。

1954年,他的《小学语文教学经验》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初版6.4万册,再版两万册。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他在育才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教学实践,很有借鉴价值。为了学生学写汉字的需要,1964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汉字的笔划和笔顺》一书,初版5万册,有两种外文版本。此书已出版近60年了,现仍然在使用中(以前在“谷歌”,现今在“百度”,都可以查到)。这本书是根据汉字结构的四关——笔划、笔顺、部首、偏旁,讲了30多种笔划,10余项笔顺规则、40种结构形式,80多个部首,800多个偏旁,是当时的通用字表6000余单字的最详尽分析和介绍。这两本书发行量之多,说明了在文化教育上推动力之大。

1966年8月,“文革”开始,随夫人单位的搬迁,他也来到嘉峪关市在酒泉钢铁公司总校当了教师。10年中,他虽然没有住过牛棚,但也受过批判。“文革”后,他努力工作,力争补上被耽误的工作和时间。1973年,他随几个同志一并参加了嘉峪关市办的师范班,培养了三期中小学教师,解决了当地有生无师的燃眉之急。1978年调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开的课是《现代汉语》《中国语文》教材自编,主要是文言文,开研究生的专课是《文字改革》。他在26年的教学中,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研究生,总结出了不少教学经验,培育出了难以计数的有用人才。

### 竭智尽力 编书存知

1953年5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抽调大批教育干部编写教材的决定,并明确指出,教

育部物色人员后,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调动。还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300个人,也不算多。”当他得知各条战线高级知识人才奇缺,无人可编写教材时,又做出部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一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初大部分知名学者进京被不知情的人传为进京赶考的奇事。当时调京的顶尖数学家是华罗庚,语文是吕叔湘,英语是许国璋,地理是竺可桢,物理是严济慈。真是全国学者名家智慧的凝聚。毋言而喻是毛泽东主席对全国中小学教材重视的一大盛事,集全国名家,凝聚全社会智慧编写中小学教材的盛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由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重新组建,调中教语文室蒋仲仁来当主任,随之调进来的编辑有陈伯吹、袁微子、文以战、陆静山、钟华、刘永让、黄秀芬、张田岩等。人教社领导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都是有名的语文专家。人员配好后即开始了“教材大会战”,不久就编写出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全套学科的统编教材。文以战负责编写的是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练习》第一册和初级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是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用书。

小学语文课本每隔三、四课就编一个《练习》,练习的主要内容和项目是字、词、句、标点符号等,教学大纲的规定非常详细,要求也非常严格。就是帮助学生复习巩固学过的课文,再扩写、缩写、重写、改写使之得到牢记、发挥和应用。这一套语文课本是解放后第一次人教社自编的,1953年动笔,1954年反复试教试用,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1955年全国通用。由于文以战工作认真勤奋,精心细致,领导常让他任责任编辑,即一本书从材料到成书,甚至于校对都是他负责。如此劳

累、责任重大的编辑工作,他默默无闻地在人教社一干就是12年。

1977年,他在兰州市编写了一年小学生乡土教材。1980年,他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借调参与编写了《新编小学生字典》。此书系教育部接受全国政协会议提案,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叶立群、陆静山为主编,结合小学语文教学和学生需求,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很受欢迎,荣获了多项殊荣。后又参与黄伯荣主编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材《现代汉语》上、下册及参考书;并与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劲共同主编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年大学教材《中国现代史》。

### 老当益壮 服务统战

1956年,文教社中共总统战委员蒋仲仁,建议他参加了文教社的九三小组,是北京西四颂赏胡同九三中央直属,同志们学习、开会都在一起,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认识不少大家和学者。如元曲专家隋书森、九三中央办公厅主任青来藻、书法巨匠启功等。

1984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甘肃九三省委主持工作的一位中共党员,遵胡耀邦指示撤回,九三学社中央得知他在兰州,就推荐他去接替,任副秘书长主持甘肃九三学社日常工作。他忠于共产党,热爱共和国,埋头苦干,乐于此事,积极开展工作。在6年时间里甘肃省九三学社成员由130多人发展到760余人,在组织机构上原仅有兰州分社和玉门小组,到甘肃省九三学社省委玉门九三学社委员会,除陇东,陇南外,在各地都有了九三学社委员会的组织。在落实政策中为陈时伟、左宗杞等几位大学老师平反。

文以战15岁投笔从戎,历经革命烽火,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百废待兴亟需人才时,他又解甲从教、从编辑,苦心孤诣地在人民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光辉的业绩。

(连载完)



# 于右任与书法长卷《满江红》

□ 郑学富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书法长卷《满江红》,气势如虹。笔画圆润厚实,刚柔并济,间架舒朗,虚实相生,沉稳中见潇洒,平正中见奇崛,一派儒雅蕴藉、坦荡磊落之风,体现了书者的艺术思想和高洁情操。

于右任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志士、辛亥革命元老、书法大师和著名诗人,他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尤其是在书法上,具有极高的贡献,享有“近代书圣”和“当代草圣”的美誉。

于右任的书法笔力雄健,笔法丰富,骨干平正,稳中求险。其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引碑入草”。他把碑学书体的笔意和审美融入到草书中来,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并取得了极高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他在总结前人章草、今草、狂草3种草书的基础上,本着“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融合了魏碑特征,书法线条综合了犀利、柔韧、潇洒、遒劲等多种审美元素,既保持了草书的潇洒灵动,又兼具了碑学书法的圆劲刚健,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被称作“于体”或“标准草书”,让草书既保持了艺术价值,又兼具了实用价值。现代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刘延濤评价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创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前后。全词情调激昂,慷慨壮烈,气盖山河!显示出一种浩然正气和英雄气质,表现了作者精忠报国的凌云壮志和乐观奋发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

岳飞的《满江红》,激励着千古中华民族的爱国心。抗日战争时期,这首词曲低沉而雄壮的歌声,更使人们领受到它的伟大的感染力量。于右任一生多次书写岳飞的《满江红》,很喜欢这首豪迈悲壮的词作,对民族英雄岳飞充满崇敬之情。抗战之初,于右任率先签名拥护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八一宣言”,反对“不抵抗主义”,主张两党合作,共同抗击外敌。他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口诛笔伐,极力反对。他应周恩来之请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不久,又为该报题词赞誉共产党“热诚爱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他通过屈武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联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设宴款待,公开支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

于右任《满江红》书法作品款署:李代总统德公正之,于右任。铃印“关中于氏”。左下盖有两方收藏印:李宗仁印,德邻。于右任手书《满江红》相赠李宗仁,含有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赞许和期待之意。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曾加入同盟会,1926年率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春,他指挥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奋勇抗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他也因此而扬名中外。

作品书写的时间是李宗仁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期间。这一时期,于右任与李宗仁曾有过两次密切交集,有赠送书法作品机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于右任曾当面向下野的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和幕后操纵,在李宗仁和孙科的府院之争中支持李而留在南京,并支持国共和谈。1949年4月国共和谈时,李宗仁邀请于右任为指导委员会成员,二人并亲自前往机场为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送行。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经常与南京联络通报情况,有时还与于右任直接通话。李宗仁想利用于右任的声望,派他去北平协助和谈。于右任十分兴奋,表示愿为和平而奔走,并积极准备,连随行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定于15日出发。这段时间,于右任与李宗仁交往甚密。

可就在于右任启程前往北平的前夕,于右任的北上之行因故成为泡影。和谈破裂,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处境十分担忧,嘱托人转告他注意安全,并表达了邀其参加新政协的殷切之意。但其时于右任周围布满了特务,身不由己。11月29日,他被国民党政府当局胁迫从重庆飞台北。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于台北。当时台湾的媒体曾以“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生珍藏纸几张”为题做了报道,赞誉于右任高风亮节、清廉节俭。

# 和书生死与共的孙犁

□ 易玲

作家孙犁,是“荷花淀派”创始人,代表作有小说《荷花淀》《芦花荡》《风云初记》等,他爱买书、爱读书、爱惜书,视书如命,一生勤勉的学人风范,深为世人感佩。

孙犁读书、买书、访书、修补书、包书衣、藏书、写书,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犁爱读书。“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人到中年大病之后,孙犁认为,读中国古书是利于养生的,于是,《浮生六记》《韩非子》《孟子》《楚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昭明文选》……他读了大量的古书,并深得心得“学习古文,主要是靠读,要读若干遍,有一些要背过;要有几种自己喜欢的选本,放在身边经常朗读;要以文为主,诗、词、歌、赋并进,收效会大些;手边要有一本适宜读古文的字典,遇到生字随时查看;学习古文,除去读,还要作,作可以帮助读,对写白话文也有好处。”

孙犁爱买书。中学毕业后在北平当差期间,他常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出逛旧书摊。被辞退后,他满不在乎,用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高高兴兴回到公寓去了,因为“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回到故乡,他喜欢到保定紫河套逛地摊书市,尽管囊中羞涩,看到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也要破天荒慷慨地买下。1949年初,孙犁到《天津日报》工作,起初“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也零零碎碎地买书;后来有了一些稿费,就成批成套地买。在《一九五五年的旅行》一文中,他回忆自己跌跌发病,听同事们的劝,外出旅行散心,在济南没有找到古旧书店,深觉遗憾;在南京,觉得游山玩水疲乏,逛古旧书店当休息;到上海也是一个人去逛书店,正赶上古籍书店开张,琳琅满目,欢欣购书。——这哪里是旅行,分明就是去各地逛书店。

孙犁藏书极富。“惟天文算术一类,因一窍不通,一本也没有。”其余无论是经史子集、书目图画,还是农桑畜牧、金石美术等书,孙犁都有。“买书就像草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喜欢的书,他还不止藏有一种版本,如《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就有4种版本,《西厢记》《牡丹亭》“不知买过多少次”,中国史书、笔记小说有几十大书柜。孙犁奉鲁迅为人生导师,鲁迅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书目,鲁迅提到过的金石美术图画书,他都奉为圭臬,照书目搜集。在《我的经部书》一文中他回忆道:“报社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从这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孙犁爱惜书。孙犁买了很多的破旧古书,“终日孜孜,又缝又补”,还说“这些年,我修整了很多残书,我发现自己在修修补补方面,很有一些天赋。如果不是现在老眼昏花,我真想到国家的文物部门,去谋个差事”。为了把自己的藏书保护好,除了爱修补书,他还爱包书衣,自嘲“爱书成癖,今包装又成癖,此魔症也”“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

孙犁轻易不借书、送书给别人,但也有例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他家拿过书。他觉得,大敌当前,那些平日他惜如性命的书,能被同志们拿去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份力量,何乐不为?《芸斋琐谈》一文里,他说自己也主动地寄赠过一些书给素不相识的用了苦心的青年人,只因他们来信或稿子写得清楚真挚,觉得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使书发挥作用并得到重视和保护。——此情此境,割舍也是爱惜的一种。

“这些书,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孙犁的一生,是和书生死与共的一生。他的光辉风范证明:真正的作家可以因人格和作品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 珍赏



笔者收藏了一对郎窑绿釉葵口盘(附图),浅腹,平底,圈足,通体施郎窑绿釉。郎窑绿与郎窑红的同类器相比,在胎、型、足等方面基本一致,只是里外釉面均为青绿色。釉面凝厚,玻璃质感很强,光亮莹彻釉色较深,开有细碎的斜片纹,并映出五彩光泽。

绿釉瓷烧制在宋代时已较普遍,明清时期的绿釉瓷发色漂亮。绿釉瓷有独特的烧制工艺,早期孔雀绿釉瓷,多在坯胎上施孔雀绿釉一次性低温烧成,因部分器物发色偏蓝,有“孔雀蓝”或“法蓝”之称。元代工匠则先在高温中将瓷胎烧成涩胎或白釉瓷,然后再施孔雀绿釉,入窑二次低温烧制。由于釉面与坯体的膨胀系数不同,瓷胎表面多呈现不同程度的细小开片,日久风化,受土壤侵蚀,釉面会出现成片成块脱落的现象。康熙官窑烧制的孔雀绿釉瓷窑温提高,胎釉紧密,胎面常有密集细小的开片现象,这是“清三代”孔雀绿釉瓷的特征。

因绿釉瓷在不同时期,不同窑口烧制,其发色略有差别。绿色釉包括孔雀绿、鹦哥绿、宝石绿、瓜皮绿等。

明代烧制孔雀绿釉,釉色有深浅二种;深者色葱翠,釉内有细碎片纹,并衬有酱白釉底,釉色鲜明艳丽;浅者在彩釉中配合使用,如茄皮紫等釉,常加上孔雀绿。清代绿釉瓷又有发展,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等是绿釉瓷中的精品。康熙时期郎窑绿釉,也称“郎窑绿”“绿哥窑”“苹果绿”。

郎窑瓷是郎廷极督造的产品,他在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由于他酷爱古陶瓷,对陶瓷很有研究,康熙皇帝发挥了他的特长,让他担任景德镇督窑官,他任期内御窑厂产品都称郎窑。

清代郎窑绿、郎窑红没有官窑款,但收藏界认可它是一种独特无款官窑器。如:康熙郎窑绿釉苹果尊,器形规正,做工考究,胎体精细,厚薄均匀,内腹中上部可见横向接胎痕,露胎处呈现“火石红”。郎窑绿用含氧化铜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色,属于铜绿釉。挂釉后经高温烧制,因工艺复杂,烧制温度极难控制,能烧出理想翠绿色釉瓷,成品率极低,所以存世量少,产品以小件为主。



# “难得一见”郎窑绿

□ 王家年